

刘绍棠著

如是我人

华文出版社

如是我人

刘绍棠 著

华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陆士华

封面设计：高原

版式设计：李雪竹

如是我人

刘绍棠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大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字数256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75-0289-9/I·99 定价：6.60元

内 容 简 介

《如是我人》是著名作家刘绍棠的一本散文、随笔集，收有作者近年来的作品90余篇。全书由《西皇城根随笔》、《月有阴晴圆缺》、《杂感丛生》、《红顶子楼漫语》等十一辑组成，其中大多是近年来受到众多读者关注与喜爱的报刊专栏，内容涉及文学、艺术、人生、友情、家庭等诸多方面，真情实感，充满文人情趣。

作者小传

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生于北京通县儒林村。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40多年文学生涯，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创作，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6部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黄花闺女池塘》。两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蛾眉》。7部散文短论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我的创作生涯》、《论文讲书》、《乡土文学四十年》、《烟笼戏语》。选集三部。

《京门脸子》获得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

1991年7月1日，被中国共产党国务院表彰

为“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专家，终身享受国家特殊津贴。1992年5月，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授予“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牌。

现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刘绍棠近照

目 录

• 怀念与哀思 •

怀念耀邦同志	(1)
难忘的谈话	(5)
父亲	(9)
魂归乡土	(12)
长眠在连理树下	(14)

• 往事知多少 •

龙头凤尾北运河	(16)
我和儒林村	(21)
我的家庭出身	(24)
无缘对面不相逢	(27)
童年，说不完的故事	(31)
大年小忆	(37)
恰同学少年	(40)
看报，来看报呀！	(44)
读书与眼泪	(48)
往事漫忆	(50)
野老	(52)

• 回忆与追忆 •

痛惜	(55)
找到位置	(58)
《青枝绿叶》的故事	(61)
田园牧歌	(65)
一株大“毒草”	(70)

念旧	(74)
还魂	(77)
韶山之夜写《蛾眉》	(80)
告别短篇小说	(85)
我更喜欢本色	(89)
荒屋寒舍土炕上	(93)
组装《京门脸子》	(97)
我爱《豆棚瓜架雨如丝》	(102)
我写《敬柳亭说书》	(107)
这个年月翻不得老皇历	(112)
僵卧孤村不自哀	(116)
双吉开笔	(121)
旧貌与新颜	(124)
拜领乡赏	(127)
· 无极的人生 ·	
如是我人	(130)
假如我不当作家	(136)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39)
享乐	(144)
无极的人生	(148)
倾诉	(151)
· 西皇城根随笔 ·	
33年3个月	(156)
梗着牛脖子的村夫	(159)
假如有一天我能行走	(161)
白头犹是春不老	(164)
今年没白活	(167)
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	(170)

找真痛快·····	(173)
豪情仍旧·····	(176)
发愤与奋发·····	(180)
· 月有阴晴圆缺 ·	
翻过去的31页·····	(184)
似水流年又一春·····	(187)
文事春忙·····	(191)
五出蛭笼·····	(195)
兴高采烈·····	(199)
闲了手忙了口·····	(202)
散记与杂感·····	(205)
热衷·····	(208)
秋意·····	(211)
三合一·····	(214)
· 杂感丛生 ·	
杂感丛生·····	(217)
万变不离土·····	(220)
“八股”他一下如何·····	(222)
文学也无农不稳·····	(224)
不如此又当如何·····	(226)
要钱与要脸·····	(228)
文学与财经·····	(230)
诗词非我本工·····	(232)
三性·····	(235)
官本位与换脑筋·····	(238)
· 红顶子楼漫语 ·	
笔无闲日·····	(241)
心驰神往凉水河·····	(243)

眼见西施·····	(245)
迎春·····	(248)
学兄和师弟·····	(251)
并非公开招标·····	(253)
能写是福·····	(255)
春归·····	(257)
两地双喜·····	(260)
译大不易·····	(263)
· 蝓笕戏言 ·	
蝓笕“戏言”·····	(266)
每日“堂会”·····	(270)
含金量不足·····	(274)
进京开眼·····	(279)
木秀于林叶盛兰·····	(283)
我也程门立雪·····	(287)
程腔·····	(291)
· 槛外断想 ·	
槛隔·····	(296)
曹碑断想·····	(298)
断章取艺·····	(301)
三忌·····	(304)
转世·····	(307)
· 始终如一 ·	
致青年文艺创作者·····	(310)
目标已经明确·····	(315)
第一要素·····	(320)
目标始终如一·····	(323)
感言·····	(327)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	(330)
后记·····	(334)

怀念耀邦同志

“再也见不到耀邦同志了……”

重病中的我，呆若木鸡，坐在床沿上，哭不出声也说不出话。我的妻子儿女怕我再一次中风，吓得劝不敢劝，哭不敢哭，七手八脚保护我不要一头栽倒。

我的心中只是一遍又一遍念叨：“再也见不到耀邦同志了……”

人活七十古来稀，耀邦同志享年七十三岁，不算短寿。但是，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年轻，永远是三十七岁，我从没有想过他会死。因而，他的逝世，使我十分震惊，非常意外，极为伤痛。

1952年冬季，耀邦同志第一次找我谈话时，他三十七岁，我十六岁，三十七年恍如隔日。现在，他与世长辞，我身患重病，人生短促而又无常。

半身偏瘫，足不能出户，我的儿子替我到耀邦同志家中吊唁。我的儿子三十三岁了，儿子的儿子也已经四岁。当年我给党组织写的请求批准结婚的报告，许多词句是耀邦同志教给我的。1957年对我进行大批判，也批判了我的结婚报告，重点正是耀邦同志教给我的那些话。我和我的妻子白头偕老，儿孙满堂，更加感念耀邦同志。

在我的成长中，耀邦同志给我的影响极大，主导着我的作文和为人之道。

几十年来，我把耀邦同志做为自己心悦诚服的导师，从没想到他是大官和首长。我在他面前百无禁忌，畅所欲言，一点也不感到呼吸困难。

他找我谈话，都是他说我听，只是在他点烟时我才能插嘴。他的谈话生动风趣，发人深思，从不打官腔，也不使用训诫口吻。他待人平等，绝无做作，他与人坦诚相见，更是出自天然品性。人们都说他容易感情冲动，这正是他的纯真和本色。他说他最讨厌低级趣味，矫揉造作便是他讨厌的低级趣味之一种。

我第一次去见他时，还是个混沌初开的半大孩子，他就同我谈起他的童年、上学、参加革命和恋爱婚姻。他说他也曾想当作家，只因天性喜欢行动，才扔下了书本，拿起枪杆子。

耀邦同志只读过初中，但是他天赋聪慧，好学不倦，日积月累，知识渊博。他说除了医学和数学书籍，任何书籍他都能读得下去，有所收获。有一回，我跟他谈起孙犁的小说，他没有读过，马上拿起电话把工作人员叫来，吩咐他立即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买孙犁的作品。还有一回，我谈起美国记者根室在《非洲内幕》引用丘吉尔描写坦噶尼喀维多利亚瀑布的一段文字，真是大手笔之作，他便问我丘吉尔的散文有没有中文译本，我说不知道，他说要查一查，如果没有也要读一读根室的引文。耀邦同志酷爱名人传记，特别嘱咐我阅读几种《拿破仑传》。他跟我谈起拿破仑的一员骁将（手头无书，名字忘记了），屡建奇功，封为亲王。此人在米兰战役中大败奥地利军，班师回国，拿破仑亲自到凯旋门迎接，二十万民众夹道欢呼，此人却面无表情；拿破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答道：“真正的骠骑兵不应活过三十岁，我现在已经三十四了。”耀邦同志谈起此人，激动地挑着大拇指说：“这个家伙，才算个英雄！”耀邦同志谈起

话来兴之所至，海阔天空。有一次不知怎么谈起孟子的“不嗜杀者王。”他便结合中国和外国革命实际，讲了很多痛心的教训。耀邦同志对人宽容，待人宽厚，不记仇，不整人，讨厌打击报复；他认为故意整人和打击报复也是“嗜杀”的一种表现。

耀邦同志对文学是很懂行的，他少年时代很喜欢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五十年代初，他担任川北军区政委时，写过一篇论塑造英雄形象的文艺论文，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他跟我谈话时，从没有专门谈论过文艺问题，但是有时谈论其他话题，他忽然联系到文艺创作，感慨颇多。记得他谈到毛主席和徐帅都是个性极强又感情丰富的人，便慨叹道：“我们的文艺作品把领袖写得像木偶。”他批评我的小说《摆渡口》：“为什么非要出现一个党支部书记呢？没有他也可以嘛。”又说：“不是每篇作品里都要写一写党员或党员干部，才算表现了党的领导。”他的这些卓越见解，我在1979年以后的创作中才逐步运用。

满腔热情地爱护青年，保护虽有严重缺点但仍有可取之处的年轻人；耀邦同志一生如此，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不认为耀邦同志多么喜爱我，他一直说我最大的毛病是骄傲。所以，他从没有当面夸奖过我，但是也许照顾到骄傲的人最爱面子，他也从没有严厉地训斥过我。1957年我被划右，处分之后他找我话别，给我以激昂的鼓励；1962年我摘掉帽子，他在跟我谈话时要我像司马迁那样发愤写作；二十年后他主管平反，找我谈话，寄予厚望。我想，在他眼里，我的可取之处可能一个是创作上努力进取，一个是从没有向他开口谋取私利。十年来，我出版了三十多本书。本来我每出版一本书都要寄呈给他。我知道他不爱看小说，也没有时间看，寄给他是为了以实物汇报我的情况。后来文艺界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我便不再给他寄书了。

关于文艺问题，耀邦同志留下了《在剧本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一书，这是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党的领导人对于文艺问题的第三部专著。真正尊敬和热爱耀邦同志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常常翻阅这本书，就像和自己的知己亲密对话。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耀邦同志给我的信，在1966年的8月红色恐怖中被家人烧掉了。我手中保存的只有他六十多岁时写给我的一封长信，这封长信仍然不失为一篇激扬文字，但是也流露出进入老年的苍凉。他说他注定看不见四化的实现了，希望我为实现四化多多工作，这使我想起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

全党全国有多少人从耀邦同志身上得到温暖和动力，人人都知道他热心肠儿，好心眼儿。人民感谢他，亲近他，人民也觉得命运亏待了他。因而，人民在他逝世后，以最深情的方式给他以殊荣。

我也在进入老年，又因病身残，倘若化悲痛为力量不是一句空话，那么今生我还有多大作为呢？我从耀邦同志身上强烈感受的两大优点，一个是革命激情，一个是手不释卷，虽在病痛中也是能够学习的。于是，我又想到，耀邦同志比较欣赏我的小说语言，但一直说我的小说胆识不足。有一次他突然问道：“你能不能写一部哈代《苔丝》那样的小说？”不等我回答，他又谈别的事情了。

虽然事隔多年，但是只要我的病情进一步好转，我是要做出回答的。

病痛折磨苦不堪言，我这篇意识流式的怀念文章只得结束。然而，这绝不是到此为止。

1989年5月

难忘的谈话

——怀念耀邦同志

1958年3月，我被划定为三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回乡劳动，以观后效。几天后，忽然接到通知，胡耀邦同志要找团中央系统具有代表性的右字号人物个别谈话，每人三十分钟。我是其中之一。这一天上午，我来到团中央，等候没有多大一会儿，便被传到小会客室去见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握手，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目光，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我莫名其妙，但是断然地一摇头，说：“没有！”

“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耀邦同志又追问一句。

“没有！”我还是摇头。

“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耀邦同志打个手势，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他面前茶几上的香烟推给我。

我不假思索就答道：“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从哪儿站起来。”

五年之期，是茅盾批判我时讲的，我便信以为真。

“好……好样的！”耀邦同志口吃着高声喊道，“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

二十年？五年的四倍……我心中一沉，苦笑了一下。

“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耀邦同志放下了

脸喝道。

我低下了头，吭哧着说：“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我把毛泽东、陆定一、安子文、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批判我的片言只语，缝连补缀回答他。

“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耀邦同志不耐烦听我言不由衷地鹦鹉学舌，怒气冲冲地挥手打断我的话。

不是大反社会主义而只是骄傲，耀邦同志给我的定罪，怎么跟毛主席大不相同呀？我不禁为之愕然，直了眼睛张大嘴。

“你连我也看不起……”耀邦同志又点起一支烟，声音平和了一些，“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自从1952年冬季我第一次跟耀邦同志谈话以来，耀邦同志一直是我心目中最敬佩又倍感亲切的导师，对他的话我没有一句不听或打折扣的。我二十岁就结了婚，便是他的主张，为的是结了婚可以避免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我怎么会看不起耀邦同志，怎么能不听耀邦同志的话呢？

“我没有……没有！”虽然我已沦为贱民，只有到处低头认罪的分儿，但是在耀邦同志面前，我不想违心和伪装。

耀邦同志叹了口气，神情很难过，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象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1956年春，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我是个“闹将”，带头对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闹了一下。大会的某位负责人告了我的状，团中央的某位书记要处分我；耀邦同志没有同意，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对我的观点很欣赏，但是不赞成我在大会上折腾，说我这是延安《轻骑队》的作风，更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的领导。我认为耀邦同志听到的情况反映，跟事实大有出入，